

当“封神”的野心变成迟到的遗憾

► 10版·文艺百家

网飞接手后，《黑镜》系列口碑崩盘 “大数据制剧”是灵药还是毒药

► 11版·影视

汪观清：笔墨线条绘出中国军魂

► 12版·艺术

70年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回顾

艺术更迭 精神永续

杨鑫磊 卞天歌

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70年来，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作为这场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铭文，始终承担着以唯物史观构建主流历史叙事、弘扬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化职责。《上甘岭》《英雄儿女》等代表作，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永恒的“旗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振奋人心、凝结力量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新主流电影”的崛起，《金刚川》《长津湖》等抗美援朝题材作品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回观众视野，并展现出了较强的生命力与感召力，逐步拓展了该题材作品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范式，愈发受到当下观众的关注与认可。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永续传承

1952年，毛主席在得知上甘岭战役的惨烈战况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志愿军将士英勇战斗的先进事迹拍成电影，在全国范围进行广泛宣传。经过老一辈电影人近四年的努力，1956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真实战史改编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上甘岭》横空出世，并随之掀起了一次空前的抗美援朝主题影片创作热潮。从1956年至1978年，涌现了一批如《长空比翼》(1958)《友谊》(1959)《奇袭》(1960)《三八线上》(1960)《英雄坦克手》(1962)《英雄儿女》(1964)《碧海红波》(1975)《激战无名川》(1975)《飞虎》(1978)等十余部抗美援朝战争电影，此外《斩断魔爪》(1954)《铁道卫士》(1960)等同时期影片亦构建于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之下。

这一股延续了20余年的创作热潮表明：英雄的时代赋予了艺术创作不绝的灵感，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敢打必胜的铮铮铁骨为电影作品提供了最坚实丰满的素材来源。

对抗美援朝战争电影的研究无疑要放在中国电影史的大框架之中。新中国战争片通过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回溯，完成对于新生国家、新生政权正义性、合法性的建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对于彼时刚刚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像叙述，自然承袭了同样的战争书写模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明显区别于同期的《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等带有一定喜剧色彩的抗战题材影片。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将志愿军英雄近乎真实地还原于极度失衡的武器配比和极度残酷的战场绝境中，追忆他们战胜敌人的艰难过程，彰显了英雄个人或群体为了和平与正义而敢于牺牲的壮举。《英雄坦克手》中装填手王大钢为掩护坦克，以自己的身体为诱饵吸引敌人炮火；《烽火列车》中李



《1956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真实战史改编的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上甘岭》问世。

长阔为救整个列车组，以吸引火力的方式将燃烧着的车节脱钩……残酷的书写并不是抗美援朝战争影片有意追求独树一帜，而仅是将真实的战场、真实的事迹进行了艺术化再现与描摹，相对直接地搬映至大银幕上。由此也折射出，抗美援朝真实战场环境之险恶、斗争之激烈、生存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

生命是个体最宝贵的东西，为了国家民族而舍弃生命、慨然赴死，是对爱国主义精神最有力的彰显。正如《英雄儿女》中王成那句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之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铿锵有力、气吞山河的八个字，凝结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更代表着人民志愿军“生的永恒”，这也成为70年来抗美援朝影片跨越时代、永续传承的重要主题。

“这场战争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你们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呢？”——人道主义的追求与传达

进入1980年代后，《战地之星》(1983)《神龙车队》(1992)《铁血大动脉》(1998)《三八线上的女兵》(2000)《北纬三十八度》(2000)《邱少云》(2010)等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中出现了对于战争更多元、丰富的艺术表达，在精神内涵方面也展现出对战争伦理、道德立场和价值观

等方面的新思考。

不同于以男性人物为主的抗美援朝影片，1983年的《战地之星》将主角光环落在女性角色上，以女性广播员白露作为故事主线：她既是志愿军为打心理战而派出的英语广播员，也是美军心中夜夜惦念的“流星小姐”。她的声音好像一曲美妙的音乐鼓励着我方志愿军战士，同时也向美军士兵揭示了战争的真相，承担着温情化视角下带有“反战”意味的功能性作用。白露在影片结尾向美军发出叩问：“你们这些幸存者记住吧，这场战争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你们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呢？这场错误的战争，难道不值得你们深思吗？”投射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发起非正义战争的谴责，同时也表达了对战争带来的生命创伤和毁灭的反思，展现出较为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反对战争、反思战争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追求，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这些同样构成抗美援朝战争电影重要的思想表达。

“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和平立场的宣告与彰显

近年来，抗美援朝影片以承担重大

国家文化使命的重要身份，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在影片数量创下新高的同时，新的抗美援朝电影的内容与品质也经受了市场和观众的考验。2020年的《金刚川》、2021年的《长津湖》、2022年的《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影片，都在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下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这些影片在艺术手法、制创水准上较此前有了较为明显的跃升。“初创期”普遍采用的程式化、“二元对立”的创作方式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血肉丰满、多元化的英雄群像。《长津湖》系列中的新兵伍万里、梅生、雷公，《金刚川》中的张义、关磊师徒，《狙击手》中的冷枪五班战士们，他们既凝聚着卡里斯马英雄的高尚品质，也有着一个个作为普通人独特生动的灵魂。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此前滑稽式、漫画式的敌人形象，以及以“敌人之弱”来展示“我军之强”的塑造倾向也相对得到矫正。《长津湖》中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一条完整的美军叙事线，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东线战场为代表的美国各层级人物形象做了全景式呈现。其中烟斗不离手、骄傲自大、善于作秀的美国老麦考阿瑟，唯命是从、盲目冒进的美第10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以及老谋深算的美海陆一师史密斯少将等高层将领，他们以个性化的形象存在于影片中，以“敌强我更强”的塑造模式相对客观地映射出志愿军英雄的伟大。

这也重新强调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虽然我们在心理上将敌人当作“纸老虎”，但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来都不是风吹即倒的弱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巨大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可以说，无论是英雄还是敌人形象的变化，均表明当下的艺术创作开始用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方式来回溯历史，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法的更新，更意味着一种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历史认知与自我认知。

有学界、业界人士将新的抗美援朝影片统归到“新主流影片”的类型之中。它既不同于教化功能更为明显和外在的传统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的主流商业电影，而是采用成熟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方法，在观念内核上弘扬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力求实现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内在统一。从目前的电影票房与网络评分数据来看，此类影片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逐渐成为时代性的电影文化潮流。这也成为近年来抗美援朝影片进入复兴期的外部环境动因。

从更为宏阔的视角上看，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文化层面的种种角力也浮出水面。以艺术化的方式向世界严正宣告自己的国家立场，表明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态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种提醒与警告。

立场与态度的宣告并不意味着传达仇恨与对立，相反，则更注重对正义与和平主题的强调。电影《长津湖》中，在伍万里准备向即将死亡的美军团长开枪时，伍千里将他的枪口推开说道：“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再如，片中两次借梅生等人物的台词言说：“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打仗了。”这些细节的设计，既体现着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理念，也传达着中国人民对避免未来战争的努力与期许。可以说，优秀的抗美援朝电影、优秀的中国军事电影，不仅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文化，也承担着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使命，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电影创作视域的拓展，也将推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和平与交流。

回顾抗美援朝战争70年的发展历史，变化的是随着时代更迭的艺术呈现，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弘扬以及反帝反霸权主题的再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抗美援朝精神是不能丢弃的民族之魂，需要不断地借助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弘扬，为持续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贡献力量。这也理应成为每一代中国电影人乃至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助教、讲师)

艺·见

博物馆“预约”，不该成为问题

陈履生

这个暑假，预约，让很多想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感到尴尬和无奈，从北京到各省会乃至市级的博物馆，都存在这样的一“约”难求。

以往我们也不乏一些很火爆的展览，但是博物馆都没有用“预约”的办法来限制观众。毫无疑问，“预约”是限流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预约”本身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预约”是双刃剑，一方面可服务于博物馆的限流，另一方面也会限制观众的自由参观。

在世界范围之内，参观博物馆预约的并不普遍，甚至是个别的——这或许是我的孤陋寡闻，能够举出的事例可能不多。在米兰参观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中·芬奇《最后的晚餐》一直是要预约的，而且通常要提前数月，不仅是限流，还为了秩序；在纽约参观移民公寓博物馆需要预约，这里的预约是一种经营的手段；再有就是像卢浮宫等一些著名博物馆中的特展，因为它的特殊性要通过限流来控制展厅内的人数，比如像2017年卢浮宫的“维米尔大展”就通过预约来限流并抬升人气，当时的卢浮宫需要消除前一年枪击事件的影响。

今天中国博物馆事业正处迅猛发

展期，几经努力，各省市级博物馆的观众量都有大幅增加，场馆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如今的预约，一方面是疫情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方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激增的观众数量，尤其到了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用预约的方式来限流，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这种方式带来的是什么？最直接的就是公众参观的不便，“能不能预约得上”成为一种担心，预约不上又催生焦虑。更为严重的是，预约的方式已经下沉到了地市级博物馆，这类博物馆本来观众就不多，近几年刚刚有点起色，预约却严重影响到了公众与博物馆的关系。

预约给公众带来的种种不便，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来说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比如像很多人的行程计划中原本没有参观博物馆，可在具体行程中可能突然想到去参观博物馆。过去的行程变化并不影响参观博物馆，说走就走；现在因为预约，这种随机性的参访就成为问题，一般来说不可能预约到当天的门票。

在这样一种需要预约的参观博物馆的方式中，从某些方面来看，对于观

众热情的伤害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矛盾，对于在中国为数不多的热门博物馆来说，是博物馆每天接待人数的最高值与具体观众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当然，有像山东青州博物馆那样通过建新馆扩大空间范围来解决矛盾，但并不是每家博物馆都能用这样的方式。博物馆的“大”总有一定限度。如何不因预约而伤害观众的观展热情，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参观博物馆的文化需求，是必须要考虑的。

既然(有的)博物馆客流量很大，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延长开放的时间，从8小时延长到10小时，甚至增加夜场(或每周一次夜场)？或者于所在的城市给当地居民在每周某个时间段开设专场或特别通道；或者每天设某一个时间段给外地突然造访的游客以具体的方便；或者给那些能够出示第二天机票或高铁票的旅行者以特别的处理。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不是用一种不可突破的铁律来对待观众的不同需求。显然，观众能够自觉走进博物馆，是经过了几十年教育的累积、社会风气的熏染和无数博物馆人多年来辛苦努力的结果。现在的公众有了对于博物馆的依赖，他

们想到博物馆中去走一走，看一看。

因为预约而带来的问题，和文物资源在城市中的配置有一定关系，也和博物馆的管理有关。客观来看，免费开放是增大客流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了让更多需要参观博物馆的观众能走进博物馆，对于一些热门的特展，或者博物馆内有着重要藏品的展厅，是否可用收费的方式来缓解供需之间的矛盾，这是主管部门需要考虑的。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发展中，用经济的杠杆来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应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在一座城市中，比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其他博物馆并非有如火爆。如果我们用预约的方式来笼而统之对待社会、对待观众，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博物馆以人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求研究、关注这之中的不同需求。如何应对不同的需求，需要用不同的方法，用多样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在我们的城市中，或许观众还不适应去参观各种不同门类的博物馆，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举世闻名的那些重要发现和重要藏品，

因此，这就造成展览资源失衡这样一种独特的景象。比如中国很多旅行者到了伦敦，只知道去闻名于世的大英博物馆，可是，却忽略了英国国家美术馆、V&A、泰特等著名博物馆；巴黎的博物馆很多，人们都挤在卢浮宫。

因为是为慕名而来，人们到了西安就想看兵马俑，就想看历史博物馆，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到了北京要去长城一样。实际上西安也有很多值得看的博物馆。那么，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通过预约来调剂确实是博物馆的管理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只是解决了博物馆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观众的问题。实际上在一个具体的工作日或者具体的开放时间之内，也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很多观众，需要更精细化的设置来设计不同时间段的预约，或者是随时调剂一些特别的需要。事实上，制度设计往往有一些疏漏，所以，最近爆出黄牛倒博物馆预约票的事件，让人们看到预约的疏漏，尽管难以理解，却真实存在。其核心是供求关系，其本质是管理问题。

在国外参观博物馆，尽管偶尔也会遇到预约问题，然而，当你告知是来自远方的中国，因为预约不上，或没有办

法解决票务的问题，是可以通融和商量的。这就如同在广东东莞市博物馆，老人是可以不受预约限制的。对于一些热门的博物馆来说，每天需要通融的参观者并不是太多，并不普遍。而这些博物馆通常都比较大，多三五十人于展厅中是看不出来的。再就是，热门博物馆一般都有常设展和临时展，也可在馆内用人工的方法来调剂那些人数较多的展厅，先让观众进来看看其它展览。除了预约不上，还有很多观众并不知道要预约，但已到了门口，失之交臂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失望。馆方应该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做一些问卷调查，了解到这些失望而归者的具体诉求。

总之，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服务，需要用多样的方法来面对多样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用“预约”两个字来解决全部的所有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用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本质并非是要拦住观众，而是在敞开大门的同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